

中国改革发展史研究（一）

Zhong Guo Gai Ge Fa Zhan Shi Yan Jiu

主 编 万伯翱 丁龙嘉 王雷亭

追溯当代中国改革

——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经验学术研讨会论文集



Tracing Down
The Path Of Contemporary
Chinese Reform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

中国改革发展史研究（一）

主 编 万伯翱 丁龙嘉 王雷亭

追溯当代中国改革

——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经验学术研讨会论文集

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追溯当代中国改革 / 万伯翱, 丁龙嘉, 王雷亭主编. — 济南:
山东人民出版社, 2012.9
ISBN 978-7-209-06776-8

I. ①追… II. ①万…②丁…③王… III. ①体制改革 - 中国 -
文集 IV. ①D61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02802 号

责任编辑: 王 晶

封面设计: 彭 路

追溯当代中国改革

— 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经验学术研讨会论文集
主编 万伯翱 丁龙嘉 王雷亭

山东出版集团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社 址: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: 250001

网 址: <http://www.sd-book.com.cn>

发行部: (0531) 82098027 82098028

新华书店经销

山东人民印刷厂莱芜厂印装

规 格 16 开 (169mm × 239mm)

印 张 18.75

字 数 290 千字 插 页 2

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次

ISBN 978-7-209-06776-8

定 价 38.0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调换。 电话: (0634) 6276022

编委会名单

主 编 万伯翱 丁龙嘉 王雷亭

副主编 刘明合 梅焕钧

编 辑 姬秀丽 赵庆海 孟宪波 李 聪

目 录 >>>



郭德宏：万里在推动农村改革中的政治智慧	1
丁龙嘉：万里对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历史性贡献	7
李进青：万里农村改革的制度经济学思考	18



韩 钢：艰难的转型：1978 年中央工作会议的农业议题	24
张晓琼, 聂家华, 牛磊：中国农村发展模式的理论探讨与经验研究 ——基于山东省部分农村的实证考察	34
赵振军, 袁梦醒：新农村建设的路径探讨：主流观点与学理分析	43
李 鹏：农民利益视角下的农村改革开放	52
赵庆海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发展的现状与趋势研究	60
王庆菊：30 年私营经济历史发展地位的演变及经验总结	70
何健雯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与经验探析	77
亓 涛：以史为镜 科学发展	82



张昌林：30 年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反思	90
郭慰慰：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历程回顾 与经验总结	98
汪 旭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回顾与反思	103

曹培忠,周艳波,刘桂艳: 邓小平与中国复关入世 ——兼论邓小平的行政法律思想	109
张 文: 试论加入 WTO 对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推动效应	116
胡素梅: 我国文化体制改革 30 年历程及经验	122
郭晓平: 山东乡村小说对农村改革的回响	129



王学典: 一个从无到有的独立学门 ——近 30 年中国大陆史学理论研究	134
刘 凌: 大学体制改革: 困境与前景	148
蒋爱翠,张清颖: 改革开放以来中等师范教育的发展历程 与现状思考	155
张 鹏: 建设生态文明 促进社会和谐	162
吴 伟: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残疾人扶贫政策发展研究	169



苏宝芳: 改革开放: 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	183
于 超: 解放思想: 中国改革开放的原动力	190



王世涛: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历史与逻辑	196
曹志清: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论析	204
李 聪: “中国模式”的马克思主义解	213



马 奔,丁龙嘉: 经济科学发展 民生显著改善 社会创新管理 ——高密市“十一五”期间的改革与发展调研报告	226
郭俊杰: 一个资源型城市的成功转型 ——新泰市“十五”、“十一五”期间大力发展非煤产业的 调研报告	236

牛之营：昔日的批判取缔对象，今天的经济社会发展支柱	
——泰安市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发展的调研报告	245



高新民：党建理论三十年若干重大发展	257
刘明合：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《历史决议》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	
理论的形成及发展	267
李合亮：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理论武装工作经验探讨	276
芦苗苗、冯国建：中国共产党 90 年风雨历程得力于“五件法宝”	
——基于对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观因素分析	282
孟宪波：方位·成就·经验	
——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 90 周年	287



后记	295
-----------	-----

万里在推动农村改革中的政治智慧

郭德宏

万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带头人和卓越领导者,早已是人们的共识,很多论著对此已经加以论述。^①他之所以能这么做,除了正确的思想路线、处处从实际出发的务实精神、群众利益至上的价值观、大改革家的气魄和胆识等原因外,还有一个重要原因,就是具有高度的政治智慧。对于这个方面,一直论述不多,只有赵树凯的《万里与农村改革中的“政治”》^②一文谈到了这个问题。下面,就谈谈笔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。

一、要认清什么才是“好的政治”、“最大的政治”

政治,是谁也离不开,但很少有人能说清,每个人都时常感到困惑的问题。20世纪40年代末,毛泽东有一次问他的秘书田家英:什么叫政治?聪明睿智的田家英竟没有答出个所以然来。毛泽东对他说:“政治的智慧,在于怎么令敌人越来越少,令同志越来越多。”^③在与敌人生死搏斗的革命年代,毛泽东的回答当然是正确

① 见吴江:《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新道路——〈万里文选〉读后》,《人民日报》1995年11月2日;吴象:《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步——读〈万里文选〉关于安徽农村改革部分》,《中共党史研究》1996年第3期;刘以顺:《万里和安徽的“大包干”》,《党史纵览》1996年第3期;刘明钢:《东风第一枝——万里与安徽农村改革》,《党史天地》1997年第9期;刘秀兰:《万里抓农村改革的四个第一》,《党史研究与教学》1998年第3期;王立新:《要吃米,找万里:安徽农村改革实录》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;温雪勇:《冲破坚冰——万里与中国农村改革》,《福建党史月刊》2001年第1期;吴象:《胡耀邦与万里在农村改革中》,《炎黄春秋》2001年第7期;安熠辉:《改革风云中的万里与邓小平》,《党史博采》2002年第10期;安熠辉:《万里——中国改革的开路先锋》,《福建党史月刊》2003年第4期;田纪云:《万里:改革开放的大功臣》,《炎黄春秋》2006年第5期;张广友、丁龙嘉:《万里》,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;王立:《万里与农村改革》,《党员文摘》2007年第4期;聂皖辉:《万里在农村改革中的智慧和胆略》,《党史纵览》2008年第9期;黄德双:《万里农村改革思想探析》,2008年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;黄禹康:《安徽原省委书记万里拉开农村改革序幕》,《老人世界》2009年第1期;先安顺:《论万里安徽时期农村改革思想的理论贡献》,《中共铜仁地委党校学报》2009年第2期;丁龙嘉:《万里在农村改革中的三大贡献》,《炎黄春秋》2009年第3期;先安顺:《论万里安徽时期农村改革思想形成的基本历程》,《中共铜仁地委党校学报》2010年第5期;何健雯、赵庆海:《1978年前后万里农村改革精神研究》,《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》2009年第9期等。

② 载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》(人文社会科学版)2009年第2期。此文又名《万里与农村改革》,载《中国发展观察》2009年第1期,《发展》2009年第2期,邓鸿勋、陆百甫主编《国际金融危机与中国农民就业》,中国发展出版社2010年版,第348~365页。

③ 丁学良:《人的解放:改革开放的第一步》,《南方周末》2008年12月24日。

的。对于这个问题,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等人也都曾作过各种各样的解释,下过各种各样的定义。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,人们心中的“政治”似乎只剩下两条:一是,是不是符合领导人的指示;二是,是不是符合领导人提出的某些理论、原则。而正是这两条,不知束缚了多少人的手脚和创造精神,甚至使无数人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。

万里 1977 年 6 月担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后,也碰到了这个棘手的问题,遇到了巨大的政治阻力。1978 年安徽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旱,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困难。为了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,万里支持一些灾害严重的地方采取“借地度荒”、“包工到组”、“包产到户”等办法。可是,这些措施受到一些人的强烈反对,并被扣上种种吓人的政治大帽子。为了破除这些政治上的阻力,万里对政治作出了新的解释。

首先,以民生为标准,把政治分为“好的政治”和“坏的政治”。1978 年秋,在一次省委座谈会上研究如何解决凤阳农民外流讨饭问题时,有人说那里的农民并不是因为生活困难,而是因为有讨饭的“习惯”。万里气愤地指出:“胡说!没听说过讨饭还有什么习惯!讲这种话的人立场站到哪里去了,是什么感情?我就不相信有粮食吃,他还会去讨饭。”“共产党不代表人民利益、不关心人民生活,算什么共产党?要你这个党干什么?哪个拥护你?我就不拥护那种让人要饭、饿死人的党。”“我们共产党人怎么可以不关心群众的吃饭问题呢?谁不解决群众吃饭问题,谁就会垮台。”“我们说共产主义是天堂,如果天堂穿不上裤子,吃不上饭,老百姓去不去呢?”他反复地强调:“老百姓没有饭吃,就是最坏的政治。”^①

其次,明确指出四个现代化建设是当前最大的政治。1978 年秋他在省委座谈会上研究如何解决凤阳农民外流讨饭问题时,已经明确指出这个问题,他说:“把人民生活、人民的民主权利放在第一位,这叫不叫政治?这才是最大的政治嘛!”“只要老百姓有饭吃,能增产,就是最大的政治。”^② 1979 年 12 月 25 日,他在安徽省人代会上关于农业问题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:“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,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,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基础。只有把生产搞好了,改善了人民生活,才能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,更好地发展其他事业。这两年,我们始终把恢复和发展生产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,坚持以生产为中心。这样做,顺民心,合民意,对我省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,起着决定性作用。许多同志在实践中体会到,四个现代化的建设确实是当前最大的政治。国家的巩固,社会的安定,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,最终都取决于现代化建设的成功,取决于生产的发展。”^③

①② 赵树凯:《万里与农村改革中的“政治”》,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》(人文社会科学版)2009 年第 2 期。

③ 《万里文选》,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,第 138~139 页。

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,万里讲的都是非常简单的生活常识,从群众要吃饭,要生活,阐述了什么才是好的政治,什么才是最大的政治,从而颠覆了那些政治上的大道理,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政权的正当性建立在了现实生活层面上。可以说,这是确立了新的意识形态。这种新的意识形态,成为安徽农村改革突破的理论基础。同时,这也是“关于农村改革最早的政治动员”,以生活常识启动了思想的解放。^①

如果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,邓小平等人已经提了出来,以民生为标准,把政治区分为“好的政治”和“坏的政治”,则是万里首次提出的。这种区分,确实打破了那种对政治的空泛概念,使人们知道政治有好坏之分,而区分其好坏的标准,不是领导人的意见和他们提出的某些理论、原则,而是看它是不是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、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,也就是要以民生为根本标准。这个标准,和生产力标准、以人为本、执政为民等理论、原则是完全一致的,对于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,在今天和以后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。

二、要正确处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

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,经济是基础,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,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。可是在传统的意识形态中,政治却可以脱离经济,经济反过来要它为它服务。一些人反对和指责万里在安徽进行的改革,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搞清楚政治和经济的关系。为了破除政治上的阻力,万里1980年7月28日在总结30年的教训时,指出过去的一个“很大的问题”就是没有正确处理政治和经济的关
系,他说:“马克思说过,经济是基础,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。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,就会促进生产的发展;不适应,就会阻碍生产的发展。多少年来,只抓‘政治’,不讲经济,不断搞‘阶级斗争’,搞‘穷过渡’,批‘唯生产力论’。什么‘大批促大干’,成天割‘资本主义尾巴’。哪有那么多资本主义尾巴!由于这些错误的方针,经济工作、科研工作一直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环境来保证。……什么‘只算政治账,不算经济账’,‘政治搞好了,经济自然会上去’,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则。我们要求解放思想,实事求是,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,把人民生活、人民的民主权利放在第一位,这叫不叫政治?这才是最大的政治嘛!”^②

这样,万里就清楚地阐述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,正确地说明经济才是最根本的,人民的生活、人民的民主权利才是第一位的,政治必须为经济基础服务,为提高人民的生活,增强人民的民主权利服务,而不能妨碍经济建设,不能妨害人民的生活、人民的民主权利,从而抽调了那些不顾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“空头政治”、

① 赵树凯:《万里与农村改革中的“政治”》,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》(人文社会科学版)2009年第2期。

② 《靠政策靠科学抓好农业区划工作》(1980年7月28日),《万里文选》,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,第152页。

“坏的政治”的立脚点,进一步为农村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石。

三、要分清什么是社会主义、资本主义

长期以来,我们并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,什么是资本主义,但是习惯于把自己确定的某些原则、做法认定是社会主义的,而把不同于这些原则、做法的东西,不管是不是有利于生产、有利于改善人民的生活,统统认为是资本主义的,是要不得的。因此,是不是搞所谓的社会主义,成为一个根本性的政治原则,也成为加在人们头上的一个紧箍咒。万里在推行农村改革的过程中,也遇到了这样的指责和非难,认为他搞的不是社会主义,而是资本主义,从而使很多人对这些改革措施产生疑虑,甚至望而却步。为了破除这个紧箍咒,万里从几个方面阐述了什么是社会主义,什么是资本主义。

首先,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,只有让人民富裕起来,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。

1978年秋,他在省委座谈会上研究如何解决凤阳农民外流讨饭问题时就说:“社会主义还要饭,那叫什么社会主义,解放快30年了,老百姓还这么穷,社会主义优越性哪里去了?无产阶级是因为受穷才革命,革命不是为了受穷,要是为了受穷,还革命干什么?我们不能以牺牲人民的利益和生命来换取‘社会主义’,那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,社会主义绝不是让人民挨饿受穷,而是让人民活得更美好。”^①

1979年6月5日,他在定远县藕塘区和凤阳县调查时的谈话中再次指出:“农民是注重实际的,社会主义好不好?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就好,说得再好,生活天下降,什么主义都不好。只有能增加生产,对国家多贡献,集体经济壮大,群众收入增加,才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。我看过凤阳一个生产队的材料,解放30年了还不如解放初期。如果所有的队都这个样子,共产党领导30年了还是贫穷,那么社会主义还有什么优越性呢?这个问题是个大问题。党委一定要千方百计把生产搞上去,让群众生活富裕起来。”^②

其次,指出不能按收入的多少来划分社会主义、资本主义,社会主义应该使群众生活改善得越快越好。

1979年12月25日,他在安徽省人代会上关于农业问题的讲话中,针对有些干部看到社员收入多了一点,担心“资本主义抬头”,会“削弱集体经济”,会“两极分化”的情况,阐明了这个问题,他说: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农业问题两个文件所规定的各项政策,是符合广大农民群众利益的,是同目前农业生产力的水

^① 赵树凯:《万里与农村改革中的“政治”》,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》(人文社会科学版)2009年第2期。

^② 《尊重农民意愿,允许搞大包干》(1979年6月5日在定远县藕塘区和凤阳县调查时的谈话),《万里文选》,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,第130~131页。

平相适应的,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欢迎。但是,极“左”思想的流毒还没有肃清,有些干部看到社员收入多了一点,就担心“资本主义抬头”,会“削弱集体经济”,会“两极分化”,等等。这是不对的。“是不是资本主义,不能按收入的多少来划分。”“林彪、‘四人帮’搞的是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,而不是我们党坚持的科学社会主义。只有坚持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,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,收入越多越好,群众生活改善得越快越好,这样才能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。我们只能用办好集体经济,使农民从集体经济的发展中得到实际利益的办法,来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,而不能用损害农民利益的办法,来强制他们走‘社会主义道路’。”^①

从1978年开始,邓小平就在考虑什么是社会主义,怎么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问题。万里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、资本主义的论述,与邓小平的探索是同时进行的,有异曲同工之妙。他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指明社会主义的本质,但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。正如有的评论所说,万里所进行的论证虽然不是“引经据典的严密论证”,而是“朴素的论证”,但这是“最有力量的论证”,是“最高层次的理论论证”,它“解决了根本的理论问题”,从而打破了那种“用自己建构出来的‘社会主义’理念来裁夺生活”,包括规制人民群众的行为和活动的荒唐做法。^②这在当时极“左”思潮还很浓厚的情况下,确实是振聋发聩的,从而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,为农村改革奠定了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。

四、充分肯定农业生产责任制是社会主义的

由于“左”的思想的长期影响和禁锢,很多人认为只有集体干活、坚持三级所有制原则,才是社会主义的,否则就是资本主义的,从而使农业生产责任制在推行过程中遇到重重阻力。为了解除这些思想禁锢,破除这些阻力,万里不仅从理论上作了阐明,而且针对一些人指责和非难,对一些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具体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,指出几个人干活,几级核算,都不是区分社会主义、资本主义的标准,充分肯定农业生产责任制是社会主义的。

1979年6月5日,他在定远县藕塘区和凤阳县调查时的谈话中,针对有的人认为包产到组不符合社会主义的三级核算,是搞资本主义的指责,明确指出:“有人不承认包产到组是四级核算,我认为包产到组实际是四级核算,多一级就不是社会主义了?只要能增产,五级核算也可以。每家都核算才好呢!就怕不核算、不核算,平均主义,糟糕得很。你们可以开个农民座谈会,讨论一下在社会主义道

^① 《在安徽省人代会上关于农业问题的讲话》(1979年12月25日),《万里文选》,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,第142~143页。

^② 赵树凯:《万里与农村改革中的“政治”》,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》(人文社会科学版)2009年第2期。

路上如何发财致富得快些的办法。”^①

1979年12月25日，他在安徽省人代会上关于农业问题的讲话中，针对有的干部看到作业组划小了，就担心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的情况，再次指出：“这是不对的。是不是资本主义，不能按收入的多少来划分，也不能按劳动组织的大小来划分。”^②

1980年7月28日，他在关于抓好农业区划工作的讲话中，又针对只有集体干活才是社会主义，个人干活就是资本主义的说法，进一步指出：“有一种说法，‘个人干活就是资本主义，集体干活就是社会主义’。不能这样简单地划分。集体生产也可以少数几个人在一起干，适合单独操作的农活就得个人干，这不是资本主义。要敢于实践，肃清极‘左’流毒，冲破精神枷锁。”^③他认为：“根据作物情况，可以包产到人、到组，联产计酬，也可以奖励到人、到组。所有制不变，出不了什么资本主义，没有什么可怕的。”^④“即使有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，也不必大惊小怪，因为包产到户不同于分田单干。如果说分田单干意味着集体经济瓦解，退到农民个体所有和个体经营的状况，那么，包产到户并不存在这个问题，它仍然是一种责任到户的生产责任制，是搞社会主义，不是搞资本主义。”^⑤

正是在万里等人的推动下，1982年1月，中共中央批转的《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》，即著名的中共中央1982年“一号文件”，第一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肯定了联产计酬、包产到户、包干到户“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”，“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”^⑥。至此，家庭承包等责任制终于得到中共中央的正式承认，取得政治上的决定性胜利，从而迅速推广到全国农村。

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，万里在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过程中体现出的政治智慧，对政治的有关论述，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农村改革的进行，而且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。

【作者：郭德宏，中共中央党校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】

① 《尊重农民意愿，允许搞大包干》（1979年6月5日在定远县藕塘区和凤阳县调查时的谈话），《万里文选》，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，第131页。

② 《在安徽省人代会上关于农业问题的讲话》（1979年12月25日），《万里文选》，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，第142页。

③ 《靠政策靠科学抓好农业区划工作》（1980年7月28日），《万里文选》，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，第112页。

④ 《联系产量的责任制可以大胆试行》（1978年10月11日在中共安徽省委常委会议上的发言），《万里文选》，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，第109页。

⑤ 《包产到户是一种社会主义的生产责任制》（1979年12月1日在中共安徽省军区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），《万里文选》，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，第135页。

⑥ 人民出版社编：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“三农”工作的十个一号文件（1982～2008年）》，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3页。

万里对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历史性贡献

丁龙嘉

中国改革的初始,就当时的中共中央层面讲,并非放在农村。后来,邓小平之所以说“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”,是因为来自草根阶层的农民首先自发进行改革,而以万里为代表的地方领导人则因势利导,从而使改革从农村兴起。

万里在农村改革中的思想和实践,分为两个阶段。第一阶段,是从1977年6月至1980年2月,万里担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,在一个省的局部地区实行农村改革。邓小平说,“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,万里同志是有功的”;坊间传说,“要吃米,找万里”,就是对这一段情况的概括。第二阶段,是从1980年2月到1988年4月,万里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书记处书记、国务院副总理,并在一段时间内兼任国家农委主任,分管农村工作,具体指导全国的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。万里对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贡献是多方面的。将这些贡献放在历史长河中考察,有三大贡献具有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历史性意义。

一、率先突破人民公社体制,支持、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,参与领导完成了迄今为止农村最具实际意义的重大改革

人民公社在其存在的25年间,前后两次给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农民带来了巨大灾难。第一次大灾难表现为1959年至1961年,三年间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和正常出生率的锐减。对于这三年间全国人口非正常减少的情况,虽然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论不同,但都是以千万来计算的,而官方至今尚未有公开数字。第二次大灾难表现为“文革”结束时的农业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。1977年,有2.5亿农民吃不饱肚子;1978年,农民人均从集体分得粮食105千克,1/3的农民生活水平不如1950年代的前半期。

从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到1978年的20年间,以及此前的高级农业社时期,人们逐渐认识了这种体制的弊端,并探索以包产到户为主的多种办法来加以匡正。包产到户曾三起三落,每次兴起,都是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自发的要求;每次落下,都是中央决策层以其背离社会主义、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加以封杀。与此同时,人民公社既受到党纪又受到国法的保护。这期间,上至中央决策层领导人,下至基层干部和农民,凡是探索和支持包产到户者,无不受到严厉惩处。

人民公社“左”的体制冰封,最初是在以万里为省委第一书记的安徽省被突破

的。这个突破过程，实际是同“左”倾错误斗争的过程，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：一是突破“农业学大寨、普及大寨”县运动的框框，坚持以生产为中心；二是突破“三级所有、队为基础”的框框，实行包产到组；三是突破“不许包产到户”的框框，实行包产到户、包干到户，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。在整个突破过程中，万里和安徽省委在六个方面走在了全国最前列。

一是在否定“农业学大寨、普及大寨”县运动中的向生产大队核算过渡和“标准分工、自报公议”大寨评工记分法方面走在全国最前列。1977年10月，华国锋亲自主持修改农村人民公社《六十条》，并确定修改的指导思想之一是体现大寨的根本经验。而所有制方面的向生产大队核算过渡，分配制度方面的“标准分工、自报公议”的评工记分法，都是大寨的根本经验。当修改小组征求万里意见时，万里明确表示：不要强调向生产大队过渡。目前，群众有五怕：一怕过渡，二怕平调，三怕瞎指挥，四怕分配不兑现，五怕戴帽挨批判。因此，要强调稳定、团结，把生产搞上去；人心思定，目前应强调生产队自主权，解决种田人不当家的问题。如果现在提出向生产大队核算过渡，就会一枝动百枝摇。“大寨式”评工记分、死分活评，根本评不起来，不如定额到组、活评到人。明确否定上述大寨的两条根本经验，万里是全国各省、市、自治区党委书记中的第一人。

二是在开启农村改革之门方面走在了全国最前列。1977年11月28日，安徽省委下发了《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（草案）》，又称《农村六条》。《农村六条》突破的不是个别的“左”的政策，而是一系列“左”的禁区，是彻底纠正农村长期存在的“左”的错误。如《农村六条》这样的文件颁发，安徽省委是全国各省、市、自治区党委中的第一家，它奏响了农村改革的第一强音。

三是在实行包产到户方面走在全国最前列。1978年，安徽全省大部分地区遇到了百年未见的大旱。为了保障秋播秋种，省委决定“借地度荒”。“借地度荒”诱发了肥西县山南公社的包产到户。这时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农业的文件明确规定，“不许包产到户”。1979年2月6日，万里主持省委常委会议，专门研究包产到户问题。他建议把山南公社作为省委包产到户的试点。会议决议在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的试点，暂不宣传、不登报、不推广。以省委的名义在一个公社进行包产到户试点，安徽省委是全国各省、市、自治区党委中的第一家。

四是在否定人民公社体制方面走在全国最前列。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，党中央召开工作会议。万里为出席会议准备了《农业上需要研究解决的几个重大问题》的书面意见，并在会议上谈了这些意见。他指出了人民公社体制的三大弊端：一是“政社合一”，既不利于党的领导，又不利于生产发展；二是权力过分集中，易导致利用职权、按照行政命令和长官意志进行瞎指挥；三是党政领导代替社委会领导，妨碍生产的发展。并针对弊端建议改革人民公社体制，实行乡社分离。如此尖锐地指出人民公社体制的弊端，鲜明地提出改革人民公社体制，万

里是全国省、部级以上干部中的第一人。

五是在肯定包产到户姓“社”不姓“资”方面走在全国最前列。1979年底至1980年初,中共安徽省军区第六次代表大会和安徽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、安徽全省农业会议相继召开。万里在这些会议上专门阐述了“包产到户是一种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”^①的道理。给包产到户上了“社会主义”户口,安徽省委是全国各省、市、自治区党委中的第一家。

六是在预言包产、包干到户将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、覆盖全国农村方面走在全国最前列。1978年10月,万里在与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、新华社记者张广友交谈时预言说:“包产到户是大势所趋、人心所向,将会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。”^②并针对包产到户违背中央文件规定这个问题说:“一切要从实际出发,因地制宜,实事求是。切不可把中央文件和上级指示当做教条,不问实际情况如何,照搬照套,或者硬往下灌。”1980年1月9日,万里在接见农业经济管理学者杨勋时说:“凤阳搞包干到户,将来要传播到全中国、统一全中国。”预言包产、包干到户将成为历史潮流,覆盖全国农村,万里是全国省、部级以上干部中的第一人。

1980年2月,万里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后,在邓小平、陈云、胡耀邦的支持下,排除怀疑和非议,历经艰难和曲折,把包产、包干到户推向了全国。1982年1月关于农业的中央“一号文件”,明确包产、包干到户是“社会主义经济的生产责任制”,1983年1月关于农业的中央“一号文件”,称包产、包干到户等联产承包责任制“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,是马克思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”^③。自此,包产、包干到户在党的文件中取得了合法地位。两个关于农业的中央“一号文件”下达后,农民边干边选择,干部边看边后退,到1983年时,包产、包干到户已经覆盖了全国农户的95%。这时,理论、学术界经过反复调查、讨论、研究,将包产、包干到户概括为统分结合、双层经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。

在历史的进程中,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过程,就是人民公社体制消亡的过程。尽管两个关于农业的中央“一号文件”没有公开否定人民公社,但实际生活是一步步否定了人民公社。1983年10月,中共中央通知实行政社分开,建立乡政权,农村设立自治性质的村民委员会。到1985年,全国有6.1766万个乡镇人民政府取代了人民公社,92.6439万个村民委员会取代了生产大队和生产队,长达27年的人民公社完全退出了中国农村社会舞台。1992年10月,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万里,提议修改宪法中的六个问题。其中之一是“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长期不变,要在宪法中作出规定。现行宪法还有‘人民公社’的提法,应

① 《万里论农村改革与发展》,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,第60页。

② 张广友、丁龙嘉:《万里》,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,第177页。

③ 《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》,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,第253页。

当删去”^①。1993年3月，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，并公布实施。从这时起，包产、包干到户，也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取得了法律地位。万里把人民公社最终送进了历史博物馆。

万里在主管全国农村工作中，还主持了从1982年起连续五个关于农业的中央“一号文件”。人们评价说，这五个关于农业的中央“一号文件”，绘制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整幅蓝图。

1978年时，全国粮食作物总产量是30477万吨。到1984年时，全国粮食作物总产量一跃达到40712万吨，人均占有800斤，^②接近世界平均水平，使困扰中央决策层几十年的最大难题——吃饭问题，得到了解决。

在中国农村经济社会体制改革、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伟大历史变革中，万里是先行官和中央层面的主要决策者之一。

二、大力倡导、发展农村商品经济，推动农产品统派购制度改革和购销价格“双轨制”改革，主张走市场经济之路

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，迅速解决了长期未能解决的温饱问题，但如果只从这一方面来评价其意义，那是远远不够的。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，突破了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僵化模式，向商品市场经济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。

改革初期，一般只讲商品生产、商品交换，忌讳讲商品经济。有的人因提商品经济而挨过批，更何谈市场经济呢！尽管邓小平早在1979年就提出过“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”，在1980年5月肯定包产到户的同时肯定了“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”，并在后来又多次提出要搞商品、市场经济，但在一段时间内，全党并没有取得共识。

万里曾指出，我国的改革，实际上一开始就是以市场为取向的。万里从最初安徽的农村改革中敏锐地觉察到，包产、包干到户，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实质上是使农民变成了相对独立的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，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最重要的前提条件，将使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大大提高。这个判断无疑是正确的。因为农民通过承包，使土地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，成了土地的主人，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，可以不由上级而由自己决定；劳动时间和剩余产品，可以不由集体而由自己支配；专长之发挥，身份之改变，经营项目之选择，可以不受限制而由自己决定。这就为劳动力资源更有效地利用，为生产要素的流动和优化组合，为农村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合理调整，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。正因如此，万里成为中国最早提出实行商品经济、市场经济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。

① 《万里文选》，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，第620页。

② 《中国共产党执政五十年》，中国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597页。